

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

刘德杰

【摘要】邓禹家族是东汉世族中“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他们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好尚学问而不弃武略的家风。邓禹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韬略，对汉魏政治、经学、文史之学影响很深。

【关键词】东汉文化 邓禹家族 世族典范 文德教育 文学成就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3-0107-06

清人唐甄《潜书·鲜君》说：“世族贵家，其子孙鲜有贤者。”^①邓禹家族却不然。邓禹是东汉“元功之首”，孙女邓绥为和帝皇后，终身临朝称制，这个兼功臣与外戚身份的大家族代有良才，兼资文武。由于政治地位非常显赫，历来关于邓禹家族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政治方面，对其“文学”方面罕见关注。东汉的“文学”观念，实以经学为主而涵盖史传、文学、讖纬各科，其“审美意义在于以道德、礼义的教化价值作为评判依据”。^②邓禹家族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尚文好学的家风，成为世族中“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出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智慧，对汉魏政治、经学和文史之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邓禹家族的文化典范性

在东汉功臣家族中，邓禹家族是敦励儒学的典范。光武帝好儒术，功臣亦多儒者。^③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全国统一，光武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贾复、邓禹乃“并剽用兵，敦儒学”，“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④其他功臣群起效仿，光武帝偃武兴文之国策由此得以顺利实施。贾复，字君文，

南阳冠军人。“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贾复子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兼通儒术，（章帝）每宴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十三岁能诵《诗》，游学长安，与光武帝刘秀相识。天下初定，邓禹“常欲远名势”，^⑤“笃于经书，教学子孙”。^⑥贾、邓二人可谓通儒鸿才，在东汉功臣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典范意义。可以说，东汉功臣从军功起家到经学世族的转型正是从邓、贾开始的。然而，贾复早卒，其族亦人丁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州士人与东汉文学嬗变》（10BZW033）的阶段成果之一。

① 唐甄：《潜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② 郑伟：《汉代诗教思想之形成及其特殊内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③ 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4，“东汉功臣多近儒”条。

④ 《后汉书·贾复传》，下引贾复父子史料亦出此文。

⑤ 本文所用邓禹家族史传材料，除特别注明外，皆依据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版）。

⑥ 《东观汉记》卷8《邓禹传》。

不旺,家族代表性不强。邓禹家族则不然,人丁兴旺,俊才辈出,成为东汉世家大族之翘楚。《后汉书·邓禹列传》曰:“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笔者依据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陈寿《三国志》统计了东汉邓禹家族入史传者,包括汉末邓芝在内,传衍六代以上,总计50男、2皇后,其中31人封侯,3人官至三公,与范晔的说法基本吻合。《隋书·经籍志二》曰:“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乱已亡。”^①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士族族谱,虽内容不详,但至少说明:邓氏家族仕宦显达,足以列出谱系。东汉士大夫罕见不通经学者。邓禹家族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也就意味着有如此庞大的儒士队伍。东汉世家大族无不以经学为传家之本,邓禹家族的典范性不言而喻。

在东汉外戚家族中,邓禹家族是以“文”、“德”传家的典范。东汉一代,兼有功臣与外戚双重身份的世家大族有阴兴、马援、窦融、邓禹、梁统五家,各家的开国功臣皆通经史传记,子孙亦不乏著名文士。光武帝阴后、明帝马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顺帝梁后皆有才学,马后与邓后均为著名贤后,博学能文,有文传世。阴、邓两家皆出南阳,以敬慎礼法与谦退俭约著称;马援、窦融、梁统来自关西,谨约自守,而三家子孙皆有豪奢、恣肆、不拘礼法之习,关西豪放不羁之风在他们身上时隐时现。^②阴氏家族本为齐管子之后,楚汉之际迁于楚,居新野。阴氏家族既好神仙,又好巫术,阴子方祭灶神,阴长生求仙问道,和帝阴皇后迷信巫蛊之术,道家与道教之风在阴氏身上表现明显。邓氏家族则是秉礼好儒之家,和熹邓后甚至坚决反对巫蛊与淫祀,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马援与邓禹在谋略、学识、教育子孙等方面皆可媲美,少时所习也同为《诗》。马援家族亦人才辈出,马援子马廖、马防,从子马严,马严子马续、马融,皆通经艺,晓武略,亦可与邓禹家族之英才并驾齐驱,在文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一代,马、邓两家堪称兼容功臣、外戚、文化三重身份的世族“双璧”。然而,马援生长关西,靠近西北边地,范晔论其一生行事,谓之“伏波好功,爱自冀、陇”,精确地概括了马援的文化性格及其地域渊源。邓禹生长于楚夏之交的南阳,范晔说他“元侯渊谟……静其如愚”,“渊”、“静”二字正抓住了邓禹文化性格之根本。楚夏之交在战国时期即为老庄道家文化覆盖的重点区域,^③邓禹的“渊静”、“常欲远名势”,或许正是源自南阳悠久的老子文化。总之,从东汉尊儒重文、尚德轻功的主流倾向看,邓氏比其他功臣外戚家族更具代表性;

自文化的地域倾向而言,东汉朝廷推崇矜重守礼的人格风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邓禹家风正是如此,马、窦、梁三大家族却有明显的豪放尚功的关西文化倾向。显然,邓禹家族的文化性格更能代表东汉人文思潮的主流倾向。

二、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

邓禹家族突出的文化性格是与其世代相传的文德教育分不开的。邓禹是其家族教育传统的开创者。两汉之际,邓禹家族已是郡县著姓。刘秀经营河北,邓禹策马相追,与其“谋谟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元功之首”。建武初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退隐。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封禅泰山,特征邓禹行司徒事随行。明帝即位,拜为太傅。永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卒,年五十七。

光武帝尊崇儒术,多举用经学博通之士入参朝政。儒学首重修身与齐家,以邓禹为首的功臣群体本以儒者居多,国家统一后,他们率先成了敦励儒学、修养礼法的典范。东汉社会,“户习七经”,“士民秉礼”,^④光武君臣率先垂范,功莫大焉。“元功之首”邓禹是光武帝功臣中最为杰出的一员。

邓禹笃于经书,非常重视子孙的文化与德行教育。邓禹有清醒的家学家风意识——令十三子各守一经,“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养子孙”。^⑤《后汉书·邓禹传》曰:“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范晔在《邓寇传赞》中说,邓禹“勋成智隐,静其如愚”。“内文明”既指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也指

① 东汉邓氏,邓晨家族和邓禹家族最为显赫,无论为官人数,还是政治影响,邓晨家族均远不及邓禹家族,《隋志》所说的《邓氏官谱》当是邓禹家族官谱。

② 关于上述诸家事迹及家风,可参见《后汉书》各家本传及传论。贾谊曾论秦地恶俗,说:“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汉书·贾谊传》)大致言秦俗以侈靡相竞,崇尚功利,不大守礼法。马防、窦宪、梁冀等人之行事,颇有此风。赵岐《与友书》说马融“不持土节”。

③ 参见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④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⑤ 《后汉书·和熹邓后纪》。

富于内省精神，正所谓“静其如愚”，宠辱不惊。邓禹有自知之明，知己功高权重，恐逆光武帝之志，遂与贾复“剽甲兵，敦儒学”；邓禹有知人之明，“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①《后汉纪》卷14曰：“（和熹邓后）与叔父邠及诸兄语，常问祖父禹为布衣佐命时事。邠为说结发殖业，著名乡闾。遭世祖龙飞，杖策归德，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后，闭门自守，事寡姊尽礼敬，训子孙有法。……后未尝不叹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于是。’”邓绥所谓“立德”，实包括建功、立德、“殖业（研习经学）”在内。可见，邓禹在子孙教育方面用心良苦，他以身作则，亲自训导，建立起功德与学识并重的家教观念，于家族发展泽被久远。邓禹儿子中，少子邓鸿好筹策。汉明帝与邓鸿议论边事，认为他具将才，就拜为将军长史。章帝时，邓鸿为度辽将军。和帝初，鸿随窦宪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从上引邓邠教育邓绥的话可以看出，邓邠也是德行学问并修之士。

据《后汉书·邓禹传》载，邓禹十三子中，惟第六子邓训“不好文学”，此处所谓“文学”主要是指章句之学，邓训的文、德修养都不错。邓训今无文章留存，不过，《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他劝说部署安集羌胡的一段话，略可管窥其文学素养。其文曰：“今张弸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悬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这段话以四言为主，简劲生动，体察人情，恩威相济。《论语·季氏将伐颛臾》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邓训的安边策略体现的正是儒家文德思想。不仅如此，邓训对子弟的德行与学业修养，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后汉纪》卷14曰：“（邓）训，闺庭甚严。诸子进见，未尝赐席。至于（和熹邓）后，事无大小，每辄咨之。”《后汉书·邓训传》亦曰：“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亦载：“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可以看出，邓训家中，子弟从小都要接受严格的文学教育，兄弟姊妹之间，讨论问难，切磋琢磨，学风很好；同时，邓氏家教，宽严相济，形成了良好的自律传统。从邓训对待子女经传研习的态度看，邓训所谓“不好文学”，应当是指不好死守“家法”的章句之学，对于经世致用的博通之学，他是不排斥的。邓训有五子一女，鹭、京、悝、弘、闾及邓绥。邓鹭今存一文，严可均《全后汉文》题名《上疏自陈》。邓弘少习《欧阳尚书》，

入授安帝，诸儒多归附之。邓绥好学成习，终身不辍。《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云：“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邓后今存自拟诏书若干篇。

和熹邓后以光大父祖之德、教养子孙为己任，对文学教育也非常重视。《后汉书》本纪云：“（元初）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邓绥还从父祖那里继承了心忧天下的精神。她对刘氏子弟与邓氏子弟的经学教育一视同仁，并推及到国家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规制中。本纪云：“永初三年，邓太后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汉有学问的宦官（如郑众、蔡伦）就是从邓后时代开始大量出现。邓太后称制期间，两度下诏刘珍等鸿儒入学入东观校订典籍，为东汉经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邓后子侄辈中，从子甫德学传父业《欧阳尚书》。从子邓嗣，博学能文。《后汉书·邓禹传》载，邓太后去世，安帝听信谗言，迫害邓氏，邓鹭、邓闾等被逼自杀，“闾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闾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从耿氏教子看，邓氏家族，无论男女，都秉承了好学重文之家风。

邓氏家族良好的文学教育与德行教育相辅相成。邓禹教导子孙皆尊法度，子孙世传祖训。殇、安之时，和熹邓后临朝称制，兄弟辅政。邓后效法父祖，检教宗族，教学子弟，邓鹭兄弟子侄也勤谨自守，颇有德望。《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载，邓太后临朝，“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今车骑将军鹭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教，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后汉书·邓鹭传》云：“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教宗族，阖门静居。鹭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翥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鹭。鹭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永初元年，安帝封邓鹭兄弟为侯。鹭等辞让，不获准许，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陈，中有“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之语。邓后从兄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

^① 《后汉书·邓禹传》。

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顺帝时，邓康为太仆，以品行方正著称，名重朝廷。可以看出，邓禹家族在文德教育上一脉相承：邓禹“功成之后，闭门自守”，邓鹭兄弟居官显位而“阖门静居”；邓禹教导子孙要“尊法度”，邓后检敕宗族，邓鹭自髡妻子；邓禹“勋成智隐”，邓康谏邓后不从，遂闭门不仕；邓禹“笃于经书，教养子孙”；邓绥“昼省王政，夜则诵读”，并亲自督导子弟学习。邓氏家族的文德教育总归一个“律”字——律己、律宗亲。这种高度自律的宗族精神强化了邓氏家族的凝聚力，也提升了邓氏家族的朝野名望。安、顺之际，邓氏几乎遭遇灭门之灾，以大司农朱宠为代表的公卿士大夫多为邓氏鸣不平，顺帝亦“追感太后恩训”，邓氏家族方转危为安。邓禹家族人丁众多，累世显贵，在史书中却未留下明显劣迹，这在两汉外戚史上绝无仅有。如果史书记载可信的话，我们只能推出一个结论：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非常成功，宗族内部形成了良好的约束机制。可以说，邓氏家族久经政治风雨而绵延不衰，其宗族自律精神、以文德传家的自强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内生力。

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家教不仅重视“文德”，而且不弃“武略”。邓后特别提到祖父的教导——“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三国志·蜀志卷十五·邓芝传》载，邓芝，字伯苗，新野人，邓禹之后，于汉末入蜀，曾任尚书郎等职，官至车骑将军，对和合吴蜀贡献卓著。本传曰：“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据《华阳国志·巴志》载，邓芝还好弓弩，善射。从邓芝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邓禹家族文德武略兼修之风至汉末而不坠。

三、邓禹家族的文学成就

在邓禹家族中，邓禹、邓绥、邓弘、邓鹭、邓嗣、邓芝的文学影响比较大，史料也较为丰富。六人中，惟邓绥、邓鹭有单篇文章保存，邓禹和邓芝的文学才华可从史书保留下来的辞令中见其一斑。邓弘、邓嗣既无言辞留存，也无单篇文章传世，但有史料载录著述之事。因此，本文分析的邓氏文学并不拘于单篇之文。

邓禹对历史的影响，莫过于他的“河北进策”（袁宏《后汉纪》卷1记录最详）。《朱子语类》卷135：“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朱子所谓“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语）”，即邓禹在河北对光武帝所说的如何“定天下”的那番话，权且名为《河北进策》。在朱熹看来，邓禹

此策是北宋以前安邦定国的四大经典策略之一。该文不仅集中反映了邓禹政治军事上的杰出才识，也展示了邓禹简洁练达、文思缜密的文学功力。刘秀经营河北地区之时，族兄刘玄已经称帝，且颇有号召力，刘氏宗室大多做了更始大臣，刘秀也是更始所封萧王。刘秀若想建立“帝王大业”，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天下“公义”；其次，刘秀为人谨慎内敛，当时实力也很有限，要夺取天下，尚信心不足；再次，时人多信“天意”，尤信讖言，刘秀也心存顾虑。要说服刘秀成就大业，必须首先破解上述三方面的心理问题。邓禹进策，开口就将视野引向古今“圣明”境界，然后话锋一转，切入如何解决“天事与人事”问题。以刘秀之气魄，“天事”拘囿不住，“人事”处境却困厄重重。邓禹围绕“人事”问题，从更始政权不足为虑说起，一口气从“德”、“武”、“文”三个方面分析了刘秀“聪明神武”的帝王“威德”，鼓舞了刘秀信心，破除了心理障碍。然后，邓禹以“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提挈纲领，从部署“粮草”到统一天下，层层论断。史载“上笑曰：‘且相随北去。’因敕左右，号禹曰邓将军”。^①这段言辞，通观古今，总览全局，运转万里乾坤于股掌之间，气魄不可谓不雄，然而，雄放之中自有沉稳之度，睿智之中不乏豪壮之风，与战国纵横家之说辞迥然不同。

若将诸葛亮“隆中对”^②与邓禹“河北进策”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二人思路非常相似，连用语也有不少相同处，如孔明所谓“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将军）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之类，均与邓禹策辞义同语近。清蔡世远叹诸葛《隆中对》“规模宏远”唐张仲宣赞邓禹《河北进策》“文雅光国”，^③皆千古知音。

邓禹留下来的还有一段推荐寇恂的话，载于《后汉书·寇恂传》。此文开阖有度，简明扼要，亦通达睿智之文。

邓鹭现存文一篇，原载于《后汉书》本传，《全后汉文》题为《上疏自陈》，梅鼎祚《东汉文纪》题为《上邓太后辞封疏》。这篇奏疏措辞谦卑，坦诚温雅，颇能体现邓鹭谦逊谨慎的性格，亦可看出邓氏家族谨重自律之风。邓弘以《欧阳尚书》授安帝，文学修养应当也不错。

① 《后汉纪》卷1，紧接邓禹“进说”之文。

② 参见陈寿《三国志·诸葛亮武侯列传》，清蔡世远《古文雅正》卷5收录此篇，题名《隆中对》。

③ 《唐》张仲宣：《论建中兴之功劄子》曰：“臣闻汉有二十八将者，上应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国，邓禹有决胜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吴汉有绥边之略，功论树下，馘异之绩弥彰；冰结河中，王霸之诚尤著。”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478。

邓绥能属文，且善解人意。和帝封她为皇后时，曾“手书表谢”。《全后汉文》收录邓后诏书 17 篇，从语气、措辞及反映出来的心理活动看，其中的 14 篇都极像邓绥自撰之文。^① 如《策命长安侯即皇帝位》曰：“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这是以太后姿态教导安帝，不似代言。《立安帝诏》写太后尽心抚养幼帝时的殷切期望，又写突遭殇帝夭折的惊心和悲痛，说：“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又《赐周冯贵人归园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叹，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后园。相恋之情，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又《遣掖庭官人诏》云：“今悉免遣，及掖庭官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这些诏书多述及邓后的宫中生活体验，推己及人，真切细腻，实肺腑之言。《诏河南尹邓豹等》是邓后写给亲兄弟邓豹等人的，她诉说自己的良苦用心，讲述祖父的教导方法等，殷殷关切，溢于言表。该文还有生动形象的口语，如“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这些用语都不是官话，皆随口道来，当出邓后之口。从语气和文风看，邓后的《检敕外戚诏》、《报邓闾》、《敕掖庭令》、《遗诏》等诏，亦时见口语，训导之辞甚至略嫌琐细，如对面而语，典雅平实，一如邓后明察、果决、干练的为人，又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柔情，且融贯着“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的国母情怀，这些诏书应是邓后自作。

邓嗣之学，受于母亲耿氏。桓帝永寿中，邓嗣“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共同撰写《东观汉记》。东汉一代，在进入东观校书著史的文士中，博通今古文经学、史传、百家典籍以及讖纬术数之学者甚多。^② 据此推测，邓嗣既以“通博”著称，范晔又将他与享有文学盛誉的延笃并提，^③ 他的才学当与延笃不相上下。从家学体系看，邓氏家族的文学教育观念也是以“博通”为主，并不拘泥于经学家法。比如，邓禹擅长《诗》学，却令十三个儿子各习一经，邓训也让子女研读各种经传，邓绥特意从班昭学天文、算术以及讖纬典籍。据此推理，邓嗣之学大约也是经、史、文、纬诸科兼通的。

邓氏家族中，最擅长外交辞令的，恐怕要属邓芝了。《三国志·蜀书十四·邓芝传》载，建兴元年（公元 223 年），后主即位，诸葛亮欲重修吴蜀之好，恐孙权怀疑蜀汉实力，遂派尚书郎邓芝出使东吴，邓芝不负使命。传云

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於蜀。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从上文可以看出，邓芝每段言辞都是极富智慧的。他一语道破孙权疑虑，坦言为吴蜀双方利益而来。剖析利害之时，他着眼于魏、蜀、吴三方力量的对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吴蜀各自优势，以坚定孙权联蜀之志。邓芝此番谋议，最终“合吴蜀之长，为唇齿之势，以进兼天下”，^④ 光耀三国文苑。第二次出使时的答词，形象生动，气势如虹，又襟怀坦诚，集儒士节义与外交家的睿智于一身。^⑤ 两段辞令，正反对比，逻辑严密，不卑不亢，犹见邓禹风范。

从整体上说，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之文学，其作品内容与汉魏政治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其文学精神彰显的是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气度、睿智与洞见，其文本逻辑不以情感抒发为旨归，而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与“注重情感和语言个性化”的文人文学判然有别。^⑥ 当然，邓禹家族文学风格并不单一，邓禹之恢阔，

① 邓后诏书中，以下 3 篇不好判断是否是她自拟，即《以张禹为太傅徐防为太尉诏》、《举隐逸大儒诏》、《以王涣子为郎中诏》。

② 参见刘跃进《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2004 年第 1 期。

③ 延笃，南阳犍县人，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其《仁孝论》为东汉论体文之经典。

④（宋）史晓弼《莲峰集》卷 4 有《三国六朝都建康攻守人物谋议如何》将邓芝此番谋议视为三国六朝谋议文章的典范，说：“然六朝之人物谋议亦有可道者，何则？请并刘备西兼巴蜀，周瑜之策可取；合吴蜀之长，为唇齿之势，以进兼天下，邓芝之策可取也……”。

⑤ 无名氏《三国志文类》卷 52《又评邓芝张翼宗预杨戏》曰：“邓芝坚贞简亮，临官忘家。”

⑥ 参见彭玉平《王国维〈文学小言〉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权果狐疑……语芝曰：“孤诚原与蜀和亲，然

邓绥之细腻，邓鹭之温雅，邓芝之坦直，各呈异彩，时见情性之别。

在汉魏政治文化史上，邓禹家族以文德传家，不弃武略，于功臣、外戚、士族中卓然而为—代典范。邓氏家族的“文学”亦泽被广远。邓禹“河北进策”为光武建国指明路径，实为经世文之杰作；邓训、邓鸿兄弟明晓边略，文武并用，为明章时期的边境安定建立功勋；邓绥、邓鹭兄妹于殇、安两朝执掌国事，进贤纳士，其诏令奏疏，足见—代文治轨迹；邓弘、邓甫德父子以

《欧阳尚书》传家，于东汉经学亦占—席之地；邓嗣与东观群贤共著《汉记》，于东汉典制文章之流传功不可没；邓芝之辞令，于吴蜀两国之交好厥功甚伟。总之，作为东汉功臣、外戚、世家大族的文化典范，邓禹家族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

本文作者：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11届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The Virtue-Literary Education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Deng Yu's Family in Eastern Han Dynasty

Liu Dejie

Abstract: Deng Yu's family is a cultural model in Eastern Han Dynasty that would be follow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of nobility. The family always pays attention to education in virtue and literature, thus develops a family tradition that is reserved, introverted, eager to learn and not underestimating military strategy. Deng Yu family's literature is mainly of political nature, known for rigorous rational analysis, which demonstrates Deng's mind and military strategy in charge of the country. Deng Yu family's literature influences profoundly on the politics, Confucianism,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in Han-Wei period.

Key words: culture in Eastern Han Dynasty; Deng Yu's family; nobles' model; education in virtue and literature; literary achievements

观点选萃

社会治理创新与宪政建设的基本目标—致

刘建辉

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刘建辉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是改变国家社会高度—致的政府治理模式，革新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推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社会自治能力，通过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最终实现社会的善治。确立这一目标，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力量壮大、公民社会兴起、多元利益认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使社会与政府“相对平等”的地位得以确立，公民的价值尊严和作为国家、社会的主人的地位得以彰显。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相互博弈、互动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统治控制方式转型的过程。其中，既涉及价值观念、制度安排、规范设计之间的互动变化，又涉及角色定位、行为模式之间的互动变化，而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社会主义是一个与国家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国家还权于社会、确立和保障社会高度自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因此，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目标，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宪政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与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两者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是—枚硬币的两面，变革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无疑为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社会主义宪政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的动力。

(赵俊 摘编)